

## 第十五章

# 全球化的過程

Barrie Axford

### 目次

- 壹、緒論/
- 貳、從超越民族國家到全球政治? /
- 全球化的概念/
- 全球化的動力和特性/
- 全球化的媒介/

## 壹、緒論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我們將檢視全球化(globalisation)的過程；全球化對國家、社會、文化以及個人通常都會帶來強烈但也變幻莫測的衝擊。承接我們在上一章中所作出的結語會是個有用的起點：在當前國際政治發展的影響下，我們必須要修改傳統上思考與形容政治生活的方式。

「國際政治」這個觀念已廣為人知，然而就本章的主旨而言，有必要引介其他的詞彙，比如「跨國的」(transnational)、後國家的(post-national)、甚至是「全球的」(global)，才有辦法形容當前世界政治的本質。我們不應低估這些概念彼此之間的區別有多大的重要性，在開始我們進一步的討論之前，我們得先思考一下這些詞彙所代表的意義。

「國際政治」的觀念在日常語言中已經相當常見，意味著一個透過民族國家間的雙邊或多邊關係來運行的世界，例如透過條約或貿易協定、或者是透過正式的協議而成立的組織機構等。聯合國顯然就是屬於多邊國際組織的範疇內，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WTO)也是。就某方面來說，歐盟(European Union, EU)亦是如此。

### 全球化(globalisation)

一種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整個世界相互聯繫與互賴的程度越來越高，進而創造出一個單一的「世界空間」或世界體系。

請回頭查閱第十四章中關於歐盟的延伸討論, 我們已經探討過企圖分類這些制度的嘗試性努力。

**跨國政治** (transnational politics)  
跨越國家疆界的政治行動。

但正如我們在第十四章中已經看到的, 歐盟在兩種不同的主張之中掙扎; 有些人認為歐盟是個跨政府組織, 從屬於其成員國, 但另外有些人則希望歐盟是個超國界或跨疆界的新興治理組織型態, 對其成員國掌有管轄權。

跨國政治(transnational politics)這個觀念的基礎在於跨越國家疆界所採取的政治行動, 但此概念不只是指跨國界的行動而已。舉例而言, 像是紅十字會、國際特赦組織與綠色和平組織等非政府組織, 已經創造出一種不與特定領土、歷史或文化、甚至是單一國家政府之政策議程緊密相連的政治型態。羅斯諾(James Rosenau, 1990)在形容他所謂的「多核心」(multi-centric)世界, 也就是一個有許多不同類型的行為者、並接著使得政治與經濟權力散佈而非集中的世界時, 強調跨國勢力與跨國行為者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會持續增長, 而他們不受任何一個單一的民族國家所管轄掌控。他認為, 以下這些事物的行動會彰顯出所謂的「跨國性」(transnationality):

1. 跨國組織: 商業型的跨國組織如日產汽車(Nissan)或雀巢(Nestle)等, 跨國的職業性機構如國際政治學會(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等, 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如女性運動等, 全球購物團體網絡如安麗(Amway)等, 以及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之類的組織等。
2. 跨國性的問題: 例如恐怖主義、政治難民與尋求政治庇護者、外籍勞工、全球溫室效應以及聖嬰現象、或是愛滋病等問題, 這些問題危及人類的生存, 且有時是不論哪一種人或生活在何處都會遭遇同樣的問題。
3. 跨國性的事件: 由於全球新聞媒體的報導之故而具有立即性和急迫性。像是一九九五年發生於日本的神戶大地震、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危機、或是發生

於世紀之交的孟加拉大水災與莫三比克大水災，它們透過新聞媒體的報導因而成為全球性的事件，而不再只是地方性的議題。蘇格蘭當伯連小學的校園孩童槍擊案或是美國的科倫拜校園事件由於快速的資訊與圖像傳播而成為全球性的大事，並且引發全天下父母心的共鳴。大量的報導是否使觀眾成為偷窺狂，讓我們以觀賞肥皂劇的方式在享受各種數位與衛星傳播對世界災難的立即性報導，還是說這彰顯了我們在世界社會中擁有一種世界公民的身份與歸屬感，這當然是個可以繼續辯論下去的問題。

4. 跨國性的社群：舉例來說，宗教性的社群，包括主流宗教以及正統教義派，像是伊斯蘭教、猶太教、佛教與基督教等，也包括某些狂熱崇拜的教派和「新世紀」(New Age)宗教。跨國性社群的範疇還包含了環境組織以及網路用戶們所建立的「虛擬」社群，不管是「辛普森家族」(the Simpsons)卡通的愛好者或者是多發性硬化症(MS)患者所建立的聯繫網絡都算是這類虛擬社群的一種。
5. 跨國性的結構：這當然包括了生產的跨國性結構，也包括了金融的跨國性結構，但近來有越來越多的儲存、檢索、傳播與分享資訊的機制(硬體與軟體都算)，比方說商業性的資料庫或免費的公共性資料庫等。

當然，超越國家疆界的觀念(心理上、文化上以及實體上和法律上的)仍然是個相當中性的說法。「跨國性」概念以及「後國家性」(post-nationality)概念中最強而有力的地方在於：實際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之流動以及政治認同的建構等將不再(或可能不再)與民族國家扯上關係。由具有固定疆域的國家、市場力量、多邊組織以及奈芬(Marc

---

後國家性(postnationality)  
指國家性的政府單元以及  
認同已經被取代了。

---

## 全球網際經濟與民族國家

黎斯－摩格(Rees-Mogg)想像西元二二五五年時世界經濟可能會有何種樣態，因此主張未來將會發生巨大的改變，這大部分是源於資訊與傳播技術對諸多生活面向所帶來的衝擊。他列出三大要點：

1. 社會與經濟方面的加速變遷，他稱之為電子通訊革命的第二階段。
2. 亞洲經濟體相對於西方經濟體的大幅躍升。
3. 和全球經濟勢力相較之下，民族國家的力量衰退，和公民力量比起來亦是如此。

他認為，許多人在預測訊息革命的走向時，往往預設了此革命的主要影響將是給大規模組織帶來競爭性的優勢，特別是國際商業體與強權政府。二十世紀民族國家至少有部份的基礎是來自於它收稅以及運用大部分的國家收入的能力，其中大部分是用在國防以及福利預算上。黎斯－摩格認為，到了西元二二五五年，通訊技術的發展將會使國家越來越難提高稅收，因為許多原本可以課稅的交易行為將會轉而在網路空間當中進行，因而變得虛擬化，故超乎了管制所能及的範圍。隨著稅收日漸下降，現代民族國家將會左支右絀，甚至瀕臨「餓死」的窘境，雖然某些小國家如百慕達等也許有辦法自我調整以適應不同的外在環境，因為它們的經濟本來就是以流動的金融交易為基礎，或許也是因為它們並不具備福利國家般龐大的政府機關，或是肩負著維持獨立防禦能力的重擔。

但黎斯－摩格又說，最成功的「國家」將是完全沒有任何具體的地理位置的國家。它將會由新技術的專業使用者以及商業、金融、藝術等方面的網路菁英群等所構成的網絡而組成，這些人在既存的管轄疆域之外互動與交易。黎斯－摩格估計，到了西元二二五五年，這個網路國家將會擁有至少兩億五千萬名公民，其中網路世界的「有錢人」們將坐享金山銀山，而網路世界的「窮人」們則靠著不到二十萬美金的年收入維持生計。未來三十年內將出現的最壯觀的經濟奇蹟將是此網路國家的出現，而非競逐世界權力的新興主權國家，如中國大陸。

Nefin, 1986)所謂的「第三體系」(third system)組織(紮根於公民社會之中並關切全球的公共福祉)等所共同構築的世界秩序, 將比主權國家的西發里亞模式(Westphalian model)更加複雜並且更具有快速變動的無窮潛力。黎斯-摩格(William Rees-Mogg)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一號在時代雜誌上所發表的一篇關於「網際經濟」(cyber-economy)的文章暗示了這種世界的到來, 他在文中表示, 這種發展將會對現代民族國家的獨立性以及一般大眾的生活帶來巨大的衝擊。

「西發里亞」(Westphalia)指的是簽訂於一六四八年的西發里亞條約, 普遍認為此條約代表了由疆域固定的主權國家所組成的現代國際體系之誕生。

### 思考點

這些論點對你來說有說服力嗎? 你對黎斯-摩格這種網路世界式的未來深有同感嗎?

在本章的後半段我們會探討全球化對具有固定疆域的民族國家所帶來的衝擊, 並回應黎斯-摩格認為「國家正在死去」的這種極端主張。但現在先讓我們深入檢視「全球化」這個關鍵性的概念。

## 貳、從超越民族國家到全球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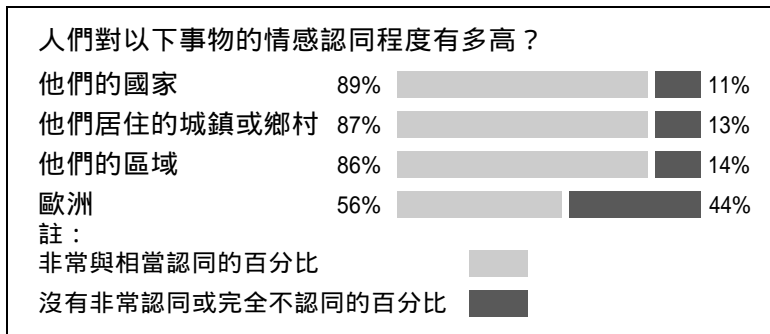
政治生活發生在疆域性的政治與社會單元之內或之間, 這是很常見的事, 而就現代來說, 其中最主要的單元乃是民族國家。政治與政治認同、以及對這些現象的研究等, 向來都是與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地點緊密相連, 文化認同亦是如此。世界各地充滿了這種疆域性民族國家的重大後果之一, 就是給現代生活的兩個最基本的附帶特質(國家認同和公民身份), 加上了空間上和概念上的區隔。我們確實很難在個別國家的脈絡之外思考與想像這些概念的意



涵。於是，許多人開始認為這些乃是一個政治社群的「自然疆界」，因此也是進行社會分析時最明顯的研究領域區隔。這使得政治學的研究大部分都聚焦於民族國家以及民族國家間的關係上，即使是「世界政治」或「國際關係」研究也是如此。

就某方面來說，這實在不讓人意外，因為正如同我們之前已經提過的，疆域性的民族國家正是我們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的典型「現代」政治形式。國家無所不在，即使某些根本算不上「國家」的地方，其政治權威也會對某固定領土主張其主權，或者是我們通常稱之為「全球公共財」的共管區，如南極洲、海洋、以及外太空這個「最後的未開拓淨土」，這些地方不在任何單一國家的管轄範圍之內。但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一點：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民族國家本身在世界政治的場域中是個晚近才出現的產物，是一六四八年西發里亞條約中所建構的政治架構的一部份，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才於十九世紀的歐洲以及北美洲慢慢建立與鞏固，大致上是於二十世紀才向外散播至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在全世界邁向現代的過程當中，民族國家以及國家界定下的社會確實是典型的政治形式，但我們不應錯誤地假定它們的核心角色乃是與生俱來的，或者認為它們乃是我們想像與實踐政治生活和治理行為的唯一方式。

我們以下將會發現，民族國家的自主權與權力正在進行重塑修正，而某些人所稱的「去空間化」或「非疆域性」的政治和治理之新興型態則越來越引人注目。這些同樣是全球化進程的一部份，而正如同我們在第五章(民主與民主化)中所討論過的，這些現象使得重要的政治概念如「公民身份」和「民主」等的定義更形複雜。決策的制訂(我們在第十三章中所討論過的那種)也因為全球性行為者的出現而被賦予了新的面向；這些行為者包括了跨國公司、利益團體、以及跨國的經濟治理機構像是世界貿易組織等。世



資料來源：歐洲調查委員會(Eurobarometer)：第 51.0 號田野調查(一九九九年的三月到四月份)。

圖 15.1：對所在地、區域、國家以及歐洲(指歐盟，包含五個成員國)的情感認同程度

界貿易組織於一九九三年烏拉圭回合的貿易談判之後，於一九九五年建立。

但是針對所謂「全球政治」到底存不存在的這個問題，我們往往基於常識會覺得「當然沒有」，至少並不符合人們對政治的一般定義。世界性的政治體系並不存在，更別提「世界國家」了(就擁有國家性的政府體系而言)。即便是已然存在好一段時間的多邊組織如聯合國或歐盟等，它們雖然都屬於某種行使治理的形式，然而也同樣都有著難以確保成員順從以及吸引認同的問題，這恰恰是因為它們缺乏大多數國家政府所擁有的那種正當性。對這種情況我們也沒什麼好訝異的。一般來說，人們不會將自己看成是個世界公民，或者是歐盟的公民；就歐盟的情況而言，人們仍然保有少數將個人與個別民族國家或國家認同緊緊相繫的那種忠誠與情感(參見圖 15.1)。因此我們必須再次聲明，對大多數的人來說，政治發生在所謂「主權國家」這種地域性單元的「內部」，除非主權國家之間有某種交換行為時才是例外。

然而，若世界政治體系並不存在，關於世界變得越來越全球化的論調卻日益常見。當人們談論「全球化」的時候，他們指的到底是什麼？

## 參、全球化的概念

全球化乃是一個或很多個將世界變成單一場域的過程。至少這是很多評論家所提出的論調，而這也是本章所支持的論點，儘管還是得加上某些重要的但書。其他學者則不太認同所謂全球化正在對世界政治與經濟脈絡產生重大影響的這種論調(Hirst and Thompson, 1999)，或是不願證明眼前所發生的一切不僅新奇而且變化萬千(Callinicos, 1995; Gray, 1998; Wallerstein, 1997)。我們將會發現，即使是那些認為全球化是個轉變過程的人，他們彼此之間對全球化的可能後果也抱持著不同的意見，這通常會變成一種規範層面上的爭論，有人認為全球化會帶來正面的影響，其他人則不這麼認為。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謹慎小心地檢視我們的定義，以便評估全球化的價值。讓我們先來看看人們如何使用這個名詞。

### 一、全球化是日益增強彼此的關連性

首先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全球化概念，也就是「跨越國界並超越民族國家的多重連結與相互聯繫性」(McGrew, 1992: 65)。此定義直接了當地肯認了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物資、服務、資本、通訊以及人群跨越國家疆界而進行流動。這種現象有諸多例子可引以為證：比方說，表 15.1 就顯示出在一九一三年到一九八四年間，幾個重要貿易國的出口量。除去某些變化期以及因戰爭和全球經濟蕭條之故而導致的顯著停頓之外，世界貿易經濟的擴張乃是這個時期的主要整體趨勢。這些數字當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在過去這二十年間，世界貿易經濟的發展模式更加複雜了。



表 15.1：「貿易」作為一種世界經濟互相聯繫性程度之增長的指標：一九一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間的出口量(以一九一三年的出口量為基準：100)

年份	法國	德國	日本	荷蘭	英國	美國
191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29	147	92	258	171	81	158
1938	91	57	588	140	57	126
1950	149	35	210	171	100	225
1960	298	155	924	445	120	388
1973	922	514	5,673	1,632	241	912
1984	1,460	774	14,425	2,384	349	1,162

註：原始數字的小數點經四捨五入計到個位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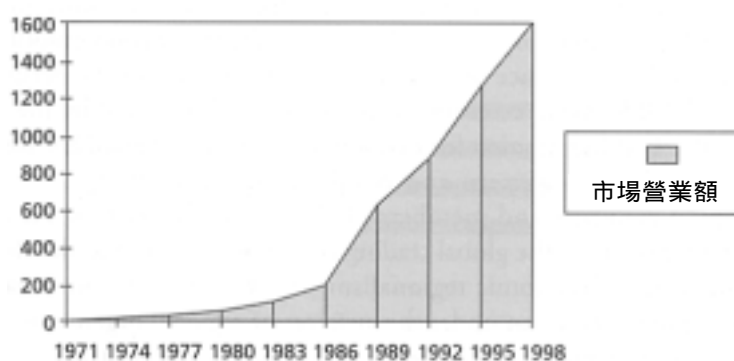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Maddison (1987: 694)

從一九八〇年代早期到中期，世界貿易的模式被兩個重要的趨勢所改變。首先是出現了新的行為者。從二次大戰結束後一直到一九八五年，世界經濟的擴張是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成員國所支配，此組織向來掌控在西方國家以及北方國家的手上。但自從那時以來，已經有許多開發中國家以及前蘇聯集團的成員們開始在全球貿易經濟中扮演更為積極的參與者角色。第二項發展乃是經濟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出現，使區域性集團內部的貿易量增加，這些貿易行為通常是在區域性組織的庇蔭之下進行，像是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NAFTA)、亞太經濟合作會議(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以及加勒比海共同體(the Caribbean Community, CARICOM)等。事實上，由於許多世界貿易行為乃是發生在區域性集團的內部而非集團彼此之間，因而使得有些觀察家認為世界經濟並不是真的已經走向「全球化」了。但是對其他人來說，即使是這種比較密集的區域互動形式也算是全球化的面向之一；保護國家與區域免於全球市場力量之負面影響的需要、或是增加己身

---

**區域主義(regionalism)**  
在國家集團之間所發生的互相聯繫和互動過程。區域化的基礎可能是共同的歷史背景、相近的地理位置或是共同的利益等。

---



資料來源：Busch (1990)

圖 15.2：世界外國交易市場之每日營業額(以百萬美元計，一九七一至一九九八年)

競爭力的需要，乃是驅動區域主義發展的動力。

近年來以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形式出現的資本流動大幅增長，以更為戲劇性的方式表現出經濟關係全球化的現象。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六年間，資本流動成長了四倍(WTO, 1996)。流動性的增長大部分是起因於多國籍公司與全球公司的投資策略(如孟山都[Monsanto]、日產汽車與微軟等)，它們企圖尋求更好的生產環境以及更大的市場。世界金融市場方面的數字則更為驚人。舉例而言，一九七九到一九九八年間，外國交易的年度營業額從一千七百五十萬兆躍升至三萬萬兆(BIS, 1998)。(每日營業額請參見圖 15.2)

這些數字全都指出全球化趨勢不斷在增強當中，雖然我們還是可以爭論道，在某些時期當中，全世界的經濟活動雖然如此密集強盛與「全球化」，但這對國內經濟所造成的壓力也一樣地大，其劇烈程度和據稱的全球化幅度不相上下(Hirst and Thompson, 1999)。

由於網路越來越受人歡迎、也越來越商業化，因而更加提升了世界上相互聯繫性的程度。最近，像是時代華納(Time-Warner)和美國線上公司(American on Line, AOL)、加拿大施格蘭集團(Seagram)和法國裴凡迪公司(Vivendi)等通



索羅斯

索羅斯(George Soros, 1930-)出生於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一九七四年移民至英國,他在此畢業於倫敦經濟學院。一九五六年,他搬到美國,開始建立與經營一個國際性的投資基金並藉此累積了大量的財富。索羅斯在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二年間的金融危機中是個要角,他對英鎊所作出的預測促使英國退出歐洲匯率機制(the 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他也參與了許多慈善工作,主要是在中歐、東歐與歐亞大陸上。他出版了許多著作,包括《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岌岌可危的開放社會》(The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Open Society Endangered, 1998, 譯者按:聯經有中譯本)、《開放社會:全球資本主義大革新》(Open Society: 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 2000, 譯者按:聯經有中譯本)。索羅斯本身就是金融市場全球化的具體表徵。

訊業鉅子間的企業併購案,預示了全球媒體新時代的到來,但或許更重要的一點是(或者至少將會具有重要性),將所有媒體內容轉移到網路上並創造出一種全球性的媒體,此舉將會越來越仰賴影像的散佈與傳播。正如麥克格魯(Tony McGrew)所說的,所有相關的資訊流動將會創造出一種新的媒體過程,在此過程中「發生在世界上某個地方的事件、決策與活動,將會對地球上另外一個距離遙遠的地方上的個人和社群產生重大的影響」(McGrew, 1992: 65)。這些發展更深一層的含意在於,這種全球的相互聯繫性使得民族國家的領土疆界和快速改變的經濟與文化生活模式間,逐漸失去高度的相關性;有越來越多擁有不同學術背景和不同理論關懷的評論者們,都異口同聲地強調了這一點。舉例來說,以下是知名管理顧問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關於全球市場之創建所發表的著作的片段摘要。他在此處談到了全球性產品的消費者之出現:

當然,大前並不是說由於全球性產品過於便利與唾手可得,因此就會使品味走向同質化,他只是認為產品的來源為何對身處於不同國家、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費者來

## 無國界的世界：互連的經濟

相信你已經讀了不少關於「全球性」產品的東西了，所以你一定也明白，事實上真正「全球性」的產品根本就很少。但是已經開始出現全球性的市場部門了；其中許多乃是以特定的國家作為營運核心。比方說，越野車的市場乃是以美國為中心，而在其他地方的銷量則在持續增長。我們有必要瞭解到的一點是，這些消費者相對於製造商而言所擁有的力量。這種力量有部份是源於消費者的偏好並不穩定。

經濟民族主義往往在大選來臨之時搶盡鋒頭，左右著民意代表們的所作所為以及特定利益團體提出的要求。但是當每個選民用他們的「錢包」投票的時候(比方說當他們走進歐洲、美國或日本的任何一家百貨公司專櫃時)，他們可不會在乎那些華麗虛假的詞藻以及揭人隱私的扒糞行為。

當你用威迪文(Waterman)或萬寶龍(Mt Blanc)出產的高級鋼筆寫字時、或者當你提著一個 LV 包包上街時，你是出於民族主義的情感才這麼做嗎？恐怕不是吧。你會買這些東西是因為它們代表了你所想要追尋的那種價值。在收銀台前，你根本不會在乎出生地或居住地的問題。你不會想到就業率或貿易赤字的問題。你不會擔心產品是在哪裡被製造出來的。「英國」的球鞋廠牌「銳步」(Reebok, 現在已經變成一家美國公司了)的鞋子是在韓國製造的、德國球鞋廠牌愛迪達(Adidas)的鞋子是在台灣製造的、或者法國球鞋廠牌「夜鷺」(Rossignol)的鞋子是在西班牙製造的，這些對你來說根本就無關緊要。你最在乎的是產品的品質、價格、設計、價值，以及對你這個消費者來說有多大的吸引力。先進國家中的年輕人們變得越來越沒有國籍意識，而清一色像是「加州人」，這在三角大國中(美國、歐洲和日本)比比皆是，也正是他們型塑了所謂互連的經濟(Interlinked Economy)。

(Ohmae 1989: 16)

### 思考點

1. 就你自己身為一個消費者來說，你覺得大前的話有道理嗎？
2. 你會意識到產品的「國家」來源嗎？
3. 如果會的話，又是哪些國家呢？
4. 你認為有任何真正的全球性產品存在嗎？

說越來越不重要, 這種發展正是創造一個「無國界世界」的重要面向之一。大前的論點起因於市場的力量, 企圖邁向一個全球經濟的時代。但社會學家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則在其一九九一年的著作中修正了相互聯繫性(interconnectedness)的觀念; 相互聯繫性原本是指一種全球性的流動, 聯繫那些原本相互分離並被時空隔絕的人們(以及團體和組織等)。紀登斯認為, 相互聯繫性乃是經濟與社會關係將觸角「延伸」至全世界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就根本上來說, 紀登斯想要強調的是, 由於時空序列歷經戲劇性的重整過程, 使現代世界相互穿透的程度越來越高, 與此同時, 人們對這些時空概念的思考方式也歷經了轉變, 因此扭轉人們附加在這些概念上的意義以及與這些概念相關的限制。在此重整階段中, 有兩個過程至關重要。第一個紀登斯稱之為「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企業體之間有越來越多的跨國交易與合作, 人們在不同的國家以及世界經濟區域之間流動, 在金融以及通訊部門當中建立起真正的全球市場, 以及建立起專業人員間的網絡, 他們透過技術性的語言彼此溝通, 而使得國籍與文化的分別不再重要。第二個過程叫做「失根」(disembedding), 指的是所有那些被從地方性的互動脈絡中連根拔起的社會關係, 並在更寬廣的時空向度上進行重組。紀登斯(Giddens, 1990)認為這些正在發生的過程將會越來越大量運用他所稱的「象徵性代幣」(symbolic token), 比如說用錢或是政府債券來做交易都是很好的例子; 「象徵性代幣」的作用在於能使時空距離相隔甚遠的行為者得以使用所有人都接受的方式來進行交易。不過我們也可以在「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的日常使用中發現這種過程的痕跡, 比方說電腦資料庫與傳真, 或是專家搜尋引擎、號碼簿以及入口網站等, 這些東西被廣泛地運用在日常生活上的許多面向上。當然, 我們也可以在大前研一口中的那些消費

---

**重要文本：**

A. Giddens (1990), 《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譯者按: 大陸有中譯本: 南京市, 譯林出版社, 2000)。

---



者行為上看到此一發展；他們不認為自己的消費行為與任何特定的地方或文化有任何意義深遠的關係，而只被全球的打造品牌之倉庫所影響。

### 全球性的打造品牌行動：資本主義的新品種？

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某期增刊上(The Sunday Times Colour Supplement, 14 October 2000)，重量級的文化界人士約克(Peter York)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打造品牌對大公司的重要性。對這些公司來說，他們的實體產品乃是次要的，他們的品牌才是其關鍵性的資產，因為人們買的是品牌而不是產品。約克認為，品牌可以透過行銷、轉包、經銷以及合資的方式，「以光速跨越國界與文化的藩籬」。Tommy Hilfiger、Gap、耐吉(Nike)、微軟、百威啤酒(Budweiser)、甚至是作為家庭與工作場所之間的「第三場域」(third place)的星巴克(Starbucks)，其實都在販賣對某種生活方式的選擇與熱望；這些生活方式的選擇與熱望乃是圍繞著品牌打造而成，也必須透過購買品牌的方式才有辦法實現之。

#### 思考點

1. 當紀登斯談論到「隔絕人們的時間與空間」時，你認為他的意思是什麼？
2. 當私人關係與其他種類的人際關係中的時空障礙都消失時，這可能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紀登斯所指出的這兩種過程加在一起後會擴大社會關係或人際互動的範圍，個人不再需要事必躬親，也不需要受限於特定的某個地理位置。換句話說，這使得對所有行為者來說，「全球」將成為越來越稀鬆平常的參考架構。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指出全球互連性大增的現象有多重要，但在我們聲稱這些發展過程使世界變成一個單一的場域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檢視行為者(個人與集體都有)對全球化的想法與感覺，因為這也會影響到他們本身的全球化經驗。



大前研一

普遍認為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 1947-)是世界上最頂尖的國際管理顧問之一。大前研一任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的合夥人有二十三年的時間；這是間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幾乎替世界上所有大公司都進行過企業重整的工作。作為一個作者與編者，他曾出版過好幾本書，也在很多刊物上發表過許多文章，像是華爾街期刊(the Wall Street Journal)、哈佛商業評論(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與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等。出版過的書籍則包括：《民族國家的終結》(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1995, 譯者按：立緒文化有中譯本)、《無國界的世界》(The Borderless World, 1990, 譯者按：聯經有中譯本)。他最新的著作乃是於兩千年出版的《看不見的新大陸》(Invisible Continent, 譯者按：天下文化有中譯本由出版)。

## 二、全球意識或以全球的角度來思考

上面所述及的過程對社會學家萊許(Scott Lash)和烏瑞(John Urry)來說(1994)，不只是所謂「客體與主體」(objects and subjects)的流動而已(主要像是商品、服務、金錢、影像、當然還有人員的流動)；還包括了不同行為者(個人、團體、社群、公司以及國家等)對全球化的特徵所保持的心理取向(orientation)。心理取向指的是人們的心理組成成分，以及他們所用來理解這個世界的那些心靈特質。唯有瞭解這些心理取向，我們才有可能評估全球性組織與全球化過程的弱點或力量，以及不同行為者在面臨這些過程時，他們會產生怎樣的感覺、可能受傷的程度又是如何。然後我們才有辦法評估這個世界是否正在一步步演變成一個單一的場域。要作出這種評估可說是困難重重。舉例來說，有些人可能會開始「以全球的角度來思考」、而不是以一個國家公民或在地的居民角度來思考，這種改變會使得他們的某些行為面向多多少少出現了變化。但在他們改變自己的認同(所謂的「認同」指的是他們覺得自己是誰、以及他們到底覺得自己歸屬於世界上的哪個地方)時，是否也重新定

義了他們本身的人格與利益，這是比較有爭議的地方。商人們通常都會被勸告說要「思考全球化、管理在地化」(think globally and manage locally)。這句話起碼意味著：他們理應意識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全球力量之效應，他們至少應當將世界視為是一個運作中的潛在整體，並據此調整自己的策略與公司文化。「全球意識」(global consciousness)一詞有一部份的意義即在於此，但即使我們發展出那種之前提過的「全球性的參考架構」意識，我們也不必然一定要放棄自己個別的國家認同，不再當個英國人或日本人，或者損及我們對個別的、在地的、傳統的事物之喜愛。

**重要文本：**

R. Robertson (1992), 《全球化：社會理論與全球文化》(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在他那本有趣的書《全球化：社會理論與全球文化》(*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譯者按：大陸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中譯本)中談到：個體與團體、整個社群甚至是民族，都「不得不置身於」他所稱的「全球環境」(global circumstance)當中(Robertson, 1992)。這些語句頗為難解，但羅伯森的意思是，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整個世界的一切，也對全球性因素會對日常生活的品質和實踐方式產生何種影響有了更清楚明白的認識：會出現這種發展的原因不計其數：可能是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全球性的問題、人口的議題、在蘇丹發生的飢荒、某家多國籍企業(MNC)在你家附近抽走了直接投資的資金因而造成大規模的失業、貨幣市場上投機買賣行為過熱導致某單一貨幣急速貶值、或者只是收看司普林格(Jerry Springer)的電視脫口秀等等，都有可能。

**思考點**

1. 從你的觀點來看，你有辦法明確指出任何會影響你的生活方式的全球性因素嗎？或者你認為羅伯森的論點太簡化了？
2. 如果你可以指出會影響你的任何因素，那麼你覺得這些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 地方性文化對網路力量的抗拒

韋維爾(Stuart Wavell)在某期的星期日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新聞回顧[News Review], 3 September 1995),他在文中探討了他所謂的「封閉社會」(closed societies)是如何暴露在無遠弗屆的網路之下,並被網路所開啟。「瀏覽」網路(surf the Internet)的自由給威權國家的統治者們帶來了兩種麻煩:一方面是道德的議題,另一方面是管制的問題;例如沙烏地阿拉伯,這個國家以往對付異議份子以及強制執行審查制度的手法都還相當傳統與簡單。以前當西方國家的雜誌上大幅刊登女性一絲不掛或是幾乎衣不蔽體的圖片時,那些審查的官員們只要在這些雜誌有機會被販賣前先通通沒收起來就好。現在即便是衛星電視也會受到管制;比方說透過管制或者完全禁止衛星訊號接收器的設立來控制衛星電視,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都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即便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體系當中(如美國),政府還是努力想要管制或監控網路上自由流動的大量資訊。在兩千年時,英國新上任的工黨政府提出一項法案,旨在授與警察攔截私人電子郵件的權力,稍後更進一步賦予雇主同樣的權力。

然而,對封閉社會與威權政體來說,網路所帶來的難題還不只是如何管制而已。政府很難控制終端機之間以數位符碼形式傳輸的資訊流,而這些資訊流中至少有部份可能會冒犯到當權者,甚至有可能具煽動性。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為了想要掌控網路,因此只對大學和醫院開放特別的上網許可。除此之外,未經授權的網路使用其刑罰非常嚴峻。試著在網路上訂購一本花花公子的雜誌圖片摺頁看看,你可能會因此而被關進大牢裡。

韋維爾認為,伊朗「文化與伊斯蘭教令部」(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Islamic Guidance)的那些審查官員們,毋寧是在和該國境內成千上萬的「網路駭客」們(也就是以非法的方式獲取資訊的那些電腦用戶)開戰;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政府則是把管制縮減,僅僅在電腦用戶企圖下載官方認為具有敏感內容的資料時,切斷用戶的電力。不過韋維爾也承認,在加強管制的同時,至少有某些「封閉社會」對資訊科技的使用與散播抱持著矛盾的態度。沙烏地阿拉伯雖然對網路無法被完全控制的本質有著戒心,但他們也同樣急著將自己擺出一副使用高科技商品與服務的先鋒國家的樣子。

韋維爾認為,長久來看,所有這類的政體都終將面臨終結審查制度的危機。



從更為政治性的角度來說，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全球化力量的這種發展，可能會引發相當不同的反應。有些人可能會主張「邁向全球化」，並開始採取一種全球化的心態，就像我們之前提過的那些公司經理人一樣，還有那些支持建立單一世界政府的人。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像某些國家的政府一樣，賣力地約束或管制金融市場的力量，以這種方式來回應變動不居的外在環境。有可能產生的另一種結果是，那些因為被暴露在全球力量之下而飽受威脅的個人或團體，將會被迫試著扭轉情勢，企圖減低全球化對自己所帶來的衝擊，或者是對整個文明所帶來的衝擊，正如我們在以下的例子中所見到的情況。

對何謂「全球意識」而言，這是一個相當有用的例子。最有趣的地方在於，雖然資訊科技這種一體化與同質化的力量似乎正在穿透封閉社會，或者摧毀時空所造成的障礙而使世界變成一個單一的整體，然而此過程同樣也引發了強大的反抗勢力，企圖捍衛文化、宗教、語言的界線以及經濟利益，或是捍衛國家主權的觀念，有時這樣的反抗甚至會激化成暴力衝突。那些希望可以逃避放縱的或具有潛在顛覆力量的全球勢力(如同我們在上述摘要中所提及的那些影響力)的政權，我們可以在這些政權中看到這種反應；或是那些殘暴的政權如一九七〇年代柬埔寨的赤棉政權，企圖逆轉該國內部所有的現代化潮流。阿富汗的前塔里班政權[譯者按：Taliban，或譯為「神學士」政權]以及緬甸政府都嚴格限制網路的使用，認為網路是種行顛覆之實的工具。英國政府於兩千年所頒佈的「調查權管制法」(*The Regulation of Investigatory Powers Act*)中，授與警察與情治單位以國家安全之名攔截網路和行動電話訊息的權力，使公眾開始顧慮個人隱私權之確保的問題；當然，該法案所引發的問題尚不僅於此。

在其他較為開放也較為穩定的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場域中，這類的恐懼也並不少見。在法國，政治界與文化

---

關於個人權利與個體性之範圍的相關議題可見諸於第一章和第八章。





### 「西雅圖夜未眠」？

界的菁英們不停地在捍衛其獨特的「法國文化模式」，企圖保護法語和法國文化不受美式英語和大眾娛樂形式(如「海灘遊俠」影集[譯者按：Baywatch，為知名的美國通俗影集])的蹂躪摧殘；另一方面，英國境內的「歐盟懷疑論者」(Eurosceptics，也就是反對歐洲進一步邁向整合原則的人)成功地在英國是否該參與「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EMU)的第三整合階段的問題上大做文章，他們的基本論調在於，這對國家的繁榮有害，並可能傷及英國的政府傳統和公法傳統。葡語系國家共同體成立於一九九六年，旨在對抗英語和西班牙語等「世界性語言」的擴張。通盤反對全球化潮流的抗議勢力也越來越常見。一九九九年底，一群抗議份子經由網路上全球運動份子之網絡組成聯盟，於西雅圖發動示威抗議，竟使重要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灰頭土臉地宣布暫時停會。

全球化引起的反彈還有很多，包括面臨全球化壓力(在歐盟的案例中則是「區域化」的壓力)時不屈不撓的地方反

## 全球化引發的反彈

繼一九九三年結束的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之後，世界貿易組織計畫發動另一波新的千禧年談判，談判的內容涵蓋了農業和服務業等議題，預計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於西雅圖召開歷時四天的會議。但大規模的公開抗議行動(包括示威遊行與街頭暴動等)使開幕典禮不得不延後，並使整場會議的氣氛降至冰點。在混亂與交相指責的聲浪中，各國談判破裂。許多人認為西雅圖抗議行動象徵著對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整體趨勢進行有力反撲的起點；在抗議行動當中，全球化過程往往被詮釋為是大型企業力量推波助瀾的結果。世界貿易組織於兩千年的二月表示要把新一回合的貿易協商談判延到春季末，但這絲毫沒有影響抗議份子們的決心，他們於兩千年的秋天重新集結在布拉格；在兩千年的十二月和二 一年的五月分別於法國尼斯和瑞典哥德堡(Gothenburg)舉行的歐盟高峰會上、在二 一年七月於日內瓦舉行的 G8 高峰會上，都可以見到他們齊聚一堂反對龐大的跨國公司與國際霸權，也就是新資本主義時代中的超級品種。齊聚於西雅圖或其他地方的反全球化或主張另類全球化的抗議份子們，他們彼此之間並沒有共同信仰的主宰性之單一意識型態，雖然新聞媒體通常都將他們貼上「反資本家」的標籤。他們其實是有著各種不同關懷的行動者，靠著日趨複雜的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ICTs)的一臂之力，在「反全球化」的大標語下集結成鬆散的網絡。許多世界級的領袖們群聚商談未來經濟計畫的場合中，都可以看到反全球化活動的身影，比方說布拉格、哥德堡和日內瓦。

G8指的是世界上七個最強大的經濟體(也就是 G7)再加上俄羅斯。

抗力量以及文化反對力量。因反彈運動衍生出來的某些團體如世界發展組織(the Worl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等，在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反對行動中相當活躍，並給那些被金融市場與跨國公司驅策壓迫的人提出了另一套全球化模式的選項。撇開個別的特殊案例不談，我們至少得要記住兩大要點。

首先，雖然他們可能在某些方面反對全球化，但在定



克萊恩

克萊恩(Naomi Klein)在一九七一年出生於加拿大。身為記者,其文章見諸於《阻擊者》(The Baffler)、《Ms》[譯者按:為美國一群女性主義者於一九七一年創立於紐約的刊物,以服務廣大的女性讀者]、與《村聲》(Village Voice)等等雜誌刊物。過去四年來,她持續在自己於《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上的聯合投稿專欄[譯者按:syndicated column,指該專欄於許多報章雜誌上同時發表刊載]探討反企業行動浪潮的興起。她出版的第一本著作《No Logo》(2000)描繪了第一波全球反企業運動的發展史[譯者按:本書中譯本由時報出版,2003]。

義每個個別的反對活動時,乃是依據他們和全球化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來定義的,或者說,這些團體正是因為全球化才有其存在的理由。對失去國家認同或宗教純正性的顧慮之所以有辦法成為一個被政治化的議題,主要是因為行為者們出於對全球脈絡的某些特質表達支持或反對,因而「不得不」成為全球脈絡的一部份。我們可以舉出另外一個例子來釐清這個難以理解的論點。許多關於全球化的討論認為「全球化」就是指西方的(也就是美國和西歐)價值、制度、產品與生活方式擴散至世界上的其他地區,其結果是侵害腐蝕了地方性的品味、傳統與認同。就此詮釋方式來看,莫斯科第一家麥當勞餐廳的問世可以被視為是全世界消費者品味同質化過程再下一城的表徵,並且暗地裡打擊了純正的俄羅斯傳統。一九九五年,一群俄羅斯企業家從商業性的(但實際上也是政治性的)角度公開回應此種全球化的威脅,設立了第一家俄羅斯速食連鎖店,店中特別專賣伏特加與俄羅斯捲心菜。重點在於:唯有把這種表達俄羅斯認同的獨特方式視為是致力於「反外國產品之進口」(這些外國產品代表了美國式的全球文化與品味)的人為努力,我們才有辦法真正地瞭解其本質;雖然這也有可



波維

波維(Jose Bove, 1953-)目前乃是全職的社運份子,過去則是一名農夫,他所獻身的首次運動乃是於一九七〇年代對法國政府所展開的農民抗爭;當時他是拉薩克區(Larzac)幾百名蓄羊農家的一員,他們企圖阻止該地區變成軍事訓練場,並且最終獲得成功。當「農事協會」(Confederation Paysanne, 一個更具草根性的農民組織,為全法第二大農民組織)於一九八〇年代晚期組成之後,波維成為該組織最主要的三位發言人之一。他接下來參與的行動還有於一九九九年初摧毀尼哈克(Nerac)實驗室中的基因改造稻米,接著又在同年的八月份於法國的米勞市(Millau)拆除了一家麥當勞。法國法院判處他三個月的有期徒刑,目前還在上訴中。

能是一種開拓新市場的樂觀的嘗試性努力。俄羅斯的愛國者同時也是企業家們,由於「不得不」成為全球脈絡(可能以芝麻麵包、肉餅與巧克力奶昔的形貌出現)的一部份,因而重新發掘了看起來似乎更為純正的飲食料理,這不僅僅是種烹飪風格上的主張,更是種捍衛本地文化的努力。同樣地,當波維(José Bove, 一位政治行動者,也曾經當過農夫)於一九九九年發動抗議麥當勞的行動時,他被廣泛地譽為民族英雄,並且自此以後成為對抗消費者資本主義之全球抗議行動的代表之一。

#### 思考點

你可以舉出其他反全球化政治的例子嗎?

第二個要點:正是因為有上述的那些例子,是故我們必須瞭解到所謂全球化的過程其實並不是單一的,而是有許多過程在相互競逐。因此所謂「世界作為一個單一的場域」的這種觀念,也並不意味著(實際上也不可能)全然的同質性,消滅掉所有的地方傳統與認同;相反地,這將會帶來更為多元的環境,充斥著各種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



相互競逐甚至在根本上彼此衝突, 因為它們對「全球境遇」採取相左的立場: 例如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伊斯蘭教和猶太基督宗教、或是國家層次與超國家和社群主義之間的歧異等等。這也是個相當重要的觀察; 因為並不是光靠市場資本主義的整合性力量、以及聰明的機器如電腦或可以上網的 WAP 手機等, 壓縮了我們對時空的感受力, 就可以把整個世界在我們不情不願的情況下變成一個亂七八糟的整體, 相反地, 我們當前所面臨的世界乃是一個更為多元的「整體」(totality), 或者說, 從某些例子裡可以看出(伊斯蘭教中的所謂基本教義派所抱持的理想或許足以為證), 這和一個「單一的世界」理應有的樣貌或模式大不相同。

這或許是相當顯而易見的觀點, 畢竟這個世界原本就是多采多姿的; 但時時提醒自己以下的論點依舊不無益處: 全球化的過程關乎有意識的選擇, 個人與團體在其中歷經種種掙扎; 他們可能有強而有力的跨國式與後國家式的經濟文化力量作為後盾, 但也可能反抗這些力量, 不僅如此, 他們也「同樣」會在非自主意識選擇的狀況下接受這些力量或被同化, 使其進入日常生活當中。雖然我們很清楚地可以發現, 許多消費者不太可能會對產品的來源產生認同感, 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在乎, 但是我們可以確信的另一點是, 當他們在選擇政治人物或政黨時卻不可能不將此因素納入考量。是故, 當有人買了一部零件來自世界各地且沒有明顯國家來源的車子時(比方說: 福特的蒙迪歐 [Ford Mondeo]、或是再度流行起來的福斯金龜車 [VW Beetle], 這兩款汽車都採取「世界汽車」的行銷手法), 他本身就已然成為全球化過程的一部份了; 由於我們日復一日地扮演著消費者或販賣者的角色, 因此我們每個人的存在就代表了貨真價實的全球化。

另一方面, 當同樣的一批人, 或是其他像他們一樣的人, 抗議一九九五年法國政府決定繼續在太平洋海底進行核子試爆的政策, 或是上街示威遊行抗議美國總統小布希



### 走自己的路？

小布希政府在某些世界性事務方面獨善其身的強烈傾向，在在顯示出強權國家長久以來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置世界輿論於不顧的能力。看看以下這些全都發生在二〇〇一年的大事就好了：即便美國不參與，歐洲與日本仍決定簽署意在解決全球溫室效應的京都議定書。這使得美國最終必須面臨一項抉擇：它到底要不要參與一個它毫無置喙餘地的體系。美國總統小布希的特使封殺了一個旨在強制禁止所有國家發動生物戰的條約草案。因為小布希的行政團隊擔憂國際性的監控組織會因而得以獲取美國軍方情報和商業機密。很少有國家拒絕通過目前某個關於兒童權的新法案，而美國正是其一。其中一項引發爭議的條款規定條約的簽署國不能監禁十六歲以下的孩童。

拒絕簽署一九九七年關於全球氣候變遷的京都議定書時，這些人所選擇支持的意識型態正是目前全球普遍認可的生態保護觀。

這類意識型態透過全球媒體轉播、網路、與多邊組織如聯合國等機構，因而在輿論的層次上廣為流傳，是故其力量有時的確能對個別國家和公司的行動加諸全球性的限制。但就像法國即便面臨上述的世界輿論壓力依舊不改其本色看來，有時這類意識型態也無力改變什麼。緬甸當權者違反普世人權的這種惡名昭彰的行徑依舊存在，即使有世界輿論的壓力仍不為所動。不過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不過份地說：世界性的或全球性的公民社會的確存在，另外，在與此相關的議題上，我們甚至可以說全球性的道德秩序正在浮現當中，我們在本章後段會回來討論這個問題。

### 三、全球性的壓縮

這些例子都意味著紀登斯(Giddens, 1990)所提及的那

種變遷中的時空經驗並不會或者不需要走向線性發展, 或者邁向某個被事先決定好了的目標, 比方說一個世界政府或是全球資本主義; 而不會發生這種單一發展的原因正是因為身陷於全球化當中的人們擁有不同的認知以及經驗, 也是因為全球化中有新的力量在運作。地理學家哈維(David Harvey)認為「時空的壓縮」正在戲劇性地加快腳步或是力量越來越強大(Harvey, 1989), 雖然他的話可能是真的, 然而從全球體系中組成份子彼此之間的關係看起來, 顯然它們不會成為一個完好的功能性整體。

這主要出於兩種原因。第一個原因: 人類學家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 1990)指出, 在當前的全球文化經濟中, 存在著某些重大的「不一致」(disjunctures), 而這些不一致乃是源於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競爭的整合「邏輯」(logics of integration); 特別是資本主義市場的普世邏輯, 以及個別民族國家和國家認同所代表的個別性邏輯, 它們彼此之間的歧異。阿帕杜萊提出了一些頗具洞察力的識見, 釐清經濟因素、政治、文化之間的某些「根本性的不一致」; 他認為, 是不同的全球性「根軸」(scapes)之間的流動的、無法被預期的互動, 深深影響了這個世界以及全球化的過程。這些「根軸」包括了:

1. 族群根軸(*ethnoscapes*): 不同的人種組成了這個我們生活其中的變化萬千的世界。觀光客、移民、難民以及國際會議中的代表們(如果我們願意相信小說家羅基[David Lodge, 1984]的說法的話), 他們都是這個變動不居的宇宙的組成份子之一。
2. 科技根軸(*technoscapes*): 當前科技與科技研發的全球性結構, 已經越來越與傳統的疆界無涉, 也越來越不需要生產商品和提供服務的特定地點了。
3. 金融根軸(*finanscapes*): 這是個全球金融高度流動的世界: 貨幣市場、期貨、商品經紀、有價證券投資

等，它們的流動是如此之快速，以致於各國政府很難對其加以管制。

4. 媒體根軸(mediascapes)：資訊與影像的電子傳播，以及其在多媒體層面上的組織，這些都與印刷品和廣播媒體之間的舊式區別擁有迥然不同的形式。
5. 意識型態根軸(idioscapes)：政治見解與標語所組成的世界正在快速擴張甚至趨於爆炸，這促使了新的政治勢力與社會運動產生，並給予其正當性；女性主義、生態主義以及生存至上主義(survivalism)都是很好的例子，除此之外還有原住民所組成的組織，如美國原住民組織(Native Americans)以及澳洲原住民組織(Native Australians)。

第二個原因是另一個與此相關的事實，那就是：世界政治中的行為者們也都是「玩家們」(players)，但是孕育這些玩家們的卻是不同的傳統與觀點想法；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對自己的利益和歷史有了既定的看法，甚至對自己的命運抱持了定見。這些個人、團體和社群並不會像練習本上的空白頁一樣乖乖等著全球化的過程在他們身上大書特書。正是因為如此，全球力量和個人認同或地方認同之間的相互影響通常是互惠式的，而非全球宰制、地方臣服的這種簡單模式，或甚至是地方永遠都在抗拒全球影響的這種簡化腳本。這使我們可以進一步釐清全球化概念中另一個細微的差別處。

#### 四、全球化是相對化與在地化

將某些消費型產品(如衛星電視接收器或避孕器等)引進一個原本很封閉的社會可能會削弱或相對化(relativise)既存的認同與生活實踐，也會挑戰到原本屹立不搖的政治利益。但這種對地方生活實踐的挑戰往往會帶來爭議。近

##### 相對化(relativisation)

單一認同的整全性或絕對性被全球性勢力的力量所稀釋、削弱的過程。

年來，阿爾及利亞在一連串社會主義政權和半軍事政權的領導下，企圖進行國家現代化，但這種努力引發通常稱之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份子的不滿與質疑，尤其是「伊斯蘭武裝團體」(Groupe Islamique Armé, GIA)，其主要的目標乃是根除那些對伊斯蘭思想與風俗構成腐化影響的西方文化。這類反應可能會也確實會對外來影響與文化的引進和使用帶來激烈的挑戰，導致電視衛星接收器被毀，或是如我們之前所看到的，伊朗禁止播放「海灘遊俠」影集的例子。這也可能挑戰到支持這些現代化事物的菁英的正當性。

我們可能稱之為「世界性文化腳本」(world cultural scripts)的文件，如國際法中的習慣法或聯合國在勞工權或婦女權或兒童權方面的宣言等等，也是屬於全球勢力的相對化力量，雖然不那麼具有戲劇性，但卻很典型。這些文件提供一個預期行為的架構(也就是一個「腳本」)，個別國家通常覺得自己有必要全部遵從之，或至少遵從其部份的規定。這類的文件實際上是國家政策的模型或指引，以及適當發展的國家輪廓。遵從在全球體系中普遍通行的規範，可以建立與加強某個政權的正當性，同時也可以促成新興的世界社會的形貌與團結。有時這些文件會體現為國際關係學者所謂的「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像是一九九二年巴西地球高峰會中產生的種種環境協議，一九九三年維也納人權與發展會議，以及一九九五年由聯合國贊助、在北京召開的女性與發展會議等等。

各國政府可以也確實會選擇對這類限制不理不睬，至少對某些特定案例來說是如此，即使這些政府還是覺得有必要對這些理想在表面上敷衍一番。俄羅斯的民主政權現在似乎已經開放到可以容忍記者自由報導普汀總統的缺點了；至少在兩千年夏天時，記者可以報導要對核子潛艇「克斯科號」(Kursk)上的俄國水手們進行救援任務時普汀總統有著怎樣的作為；但卻不可以報導政府如何嚴酷地對

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

由多多少少已經被正式法典化的具體協議和法規組成，規範國際關係中的某些面向。

表 15.2：新聞自由的地區性評估：以國家論

	自由	部份自由	不自由	國家數量
非洲	6(11%)	17(32%)	30(57%)	53
亞洲	6(25%)	4(17%)	14(56%)	24
歐洲(西部)	20(95%)	1(5%)	0	21
歐洲(東歐與新興獨立國家*)	9(33%)	9(33%)	9(33%)	27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國家	17(52%)	14(42%)	2(6%)	33
中東	1(7%)	2(14%)	11(79%)	14
北美	2(100%)	0	0	2
大洋洲	8(67%)	4(33%)	0	12
總計	69	51	66	186

註：\*新興獨立國家(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NIS)。%顯示出每一個範疇內的國家百分比。這次的調查含括了一百八十六個國家，擴張了「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自一九七九以來所進行的調查範圍。這項研究發現被許多國家的政府、學界以及新聞媒體所廣泛運用。每個國家在多大的程度上容許自由的資訊流動，決定了「自由」、「部份自由」或「不自由」的這種媒體分類。

資料來源：自由之家的新聞自由調查(2001)。

待政治異議者，也不可以報導政府在車臣(Chechnya)的戰爭行為。關於新聞自由的地區性差異，請參見表 15.2。在紐約世貿中心遭受恐怖攻擊之後，普汀總統支持組成反恐聯盟聯合對抗賓拉登和阿富汗的塔里班政權一事，被認為比俄國政府本身糟糕的人權記錄、以及其信伊斯蘭教的共和國之一內部的人民苦難等，來得更為重要。在一個高道德標準與虛偽的普世主義託詞有時只是權宜之計和現實政治的偽裝的世界中，這類模稜兩可的情況到處都是。

另一方面，來自世界社群的壓力透過波士尼亞當地的國際勢力組織起來，迫使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族領袖卡拉吉奇(Radovan Karadzic)為自己於波士尼亞內戰期間被廣泛批判的所作所為負起責任，而在一九九六年時下台；而接續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之獨裁政權。於兩千年時掌權的塞爾維亞初級民主政府，終於開始注意到國際壓力，因此以腐敗罪名逮捕了前領袖，將其引渡至荷蘭首都海牙，面臨來自國際戰爭罪行法庭的指控。二 年十



月,原本相當不願這麼做的英國終於完全將歐洲人權法融合進國內的法律條文當中,在其法律全書當中加上了新的人權法案。美國小布希總統決定不接受在二〇〇一年七月於波昂簽訂的京都議定書氣候變遷部份的折衷方案,然而媒體輿論對美國日漸增長的「孤立主義」施加壓力,認為這違背了世界主流意見,並且認為有必要與國際社群之間「重新建立起橋樑」。

全球勢力對地方認同產生的相對化力量可能導致以下的後果：

1. 由於文化同質化或同化作用的緣故而被徹底侵蝕：也就是說，地方認同被全球化給吞食了。
2. 再次肯認或強化了既存的認同(有時也被稱為再傳統化)，如宗教正統主義或其他類型的基本教派。
3. 被「混合式的」(hybrid)文化或認同所取代，為在地化和全球化之間相互調和的結果，這也包括了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交融。霍爾(Stuart Hall, 1992)頗具說服力地寫道，常見於移民社群間的那種混合式的認同，不僅僅是上述 1. 或 2. 的某種變異類型而已，而是如馬蒂皮松(Monty Python)[譯者按：為英國的六人喜劇團體]所說的：「某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 思考點

你可以想到任何混合式認同的例子嗎？舉例來說，某些人被說成是、或者自己認為自己是「愛爾蘭裔的美國人」，亦或某些西方國家的人穿著非西方社會的「民族」服飾，這些都是混合性的例子。

直接了當的抗拒確實存在，而認同的混合化現象也是，這些都使我們必須更加謹慎小心地看待那些認為全球化過程就是單純地在散佈和接納西方文化價值的論點，或

### 全球視點下的「地方」

想像一下你現在正身處於一架衛星上，而這個衛星又比所有實際的衛星遙遠很多很多，使你凌駕在它們之上；你可以遠遠地看見「地球」這顆行星，但對像你這樣心懷和平、毫無不良意圖的人來說，很不尋常的一點是，你居然擁有某種特別的科技，因此有辦法清楚地看見地球上的人們眼珠子是什麼顏色的，以及汽車牌照上的號碼。你可以看見所有的人為活動，也可以接收到所有正在發生的通訊交流 有些訊息是關於人群的移動，有些是實體上的交易，有些則是媒體的轉播。還有傳真、電子郵件、散佈影片的網絡、金融交流以及交易等等。如果再看得更仔細一點，你會看到地球上所有船和火車 再看仔細一點 你會看到非洲次撒哈拉地區的某處，有個婦人一天要走上好幾個小時的路來採集水。現在我只想強調一個很簡單的重點，而這也就是我們可以稱之為「權力幾何學」(power geometry)的東西，也就是時空壓縮現象中的權力幾何學。不同的社會團體以及不同的個人，他們和這些訊息交流與互連性之間有著非常截然不同的關係。我所想強調的不只是誰有辦法流動而誰沒有辦法的問題，雖然這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我所想強調的還有與訊息流動和人的移動有關的權力問題。不同的社會團體個別來說都與此有著獨特的關係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掌控權；有些人有辦法主動創造出流動與移動，但其他人則不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處於被動接受的那一方；有些人則實際上被此種流動所禁錮。

(D. Massey (1995) *Space, Place and Gen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146-56)

者有時是將全球化過程形容成是西方世界對其他地區的直接影響。相反地，地理學家馬西(Doreen Massey)主張我們有必要評估全球化中所含括的種種關係彼此之間的所謂「權力幾何學」(power geometry)，以下摘錄她有趣論證的一部份。

馬西讓我們注意到那些在不同種類的流動和移動中所出現的各式各樣關於權力幾何學的例子。移民、難民和

尋求政治庇護者對她來說並不屬於那些「有掌控權」的人，而經常因工作之故到處旅行的人則算是。一個一邊看著電視上播放的美國電影，一邊吃著從中國餐館外帶的食物的老人家，可能只算得上是全球化中的被動接收者，但是網路上那些虛擬世界的旅行者們則是有意識地甚至有可能是自願地參與了其世界被壓縮的過程。馬西這個蘊藏於人際關係或交易行為中的「權力幾何學」概念，同時也提醒了我們：全球化的過程乃是在既存的社會關係脈絡中開展的。對馬西來說，有錢的人會越來越有錢，而窮人們則只能看看「瑞琪脫口秀」(Rikki Lake，譯者按：為美國的一個通俗脫口秀節目)。

然而，權力幾何學的概念同樣也凸顯出本節中所要處理的兩個概念之一，那就是在地化(indigenisation)。「在地化」的例子之一為：有越來越多的日本漫畫與卡通以驚人的數目流入西方國家當中。這些卡通往往是一刀未剪的成人動畫，有時還包括科幻電影等，它們成為日本對一九九

年代晚期的全球文化最獨特的貢獻。亨尼(Tom Hiney)認為我們不該將「子彈列車與那些對公司歌功頌德的曲子」甚至是武士道與茶館等事物繼續當成是日本生活與文化的表徵(*Sunday Times, News and Travel*, 2 January 1994, p.14)。

他認為漫畫是「一種對新的庶民式日本的顛覆性想像」。他同時又表示，那些不作動畫的日本導演們則在老掉牙的好萊塢類型電影(genres)中注入活水。同時於英美等地發行的電影「兇暴之男」(*Violent Cop*)由北野武自導自演；他被影評人譽為「日本的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

就這個例子而言，日本人不只是將一種著名的西方文化形式(動畫)加以在地化，更賦予創新意義，重新外銷到西方甚至受到一般大眾的熱愛與崇拜。在前塔里班政權統治下的阿富汗，那些反對伊斯蘭社會被西方化、並且對西方的時髦科技與消費者至上傾向心存懷疑的激進份子們，卻一邊追求「就地起義」(*intifada*)、對抗以色列和美

---

在地化(indigenisation)

改寫外來文化因子以便與在地環境相調和，並符應在地的需求。

---

國對中東所施加的影響，一邊架設了自己的官方網站，而加薩市的巴勒斯坦青少年們更是穿著耐吉球鞋和仿Tommy Hilfiger的T恤跑來跑去。就地方與全球的關係而言，這些例子又告訴了我們什麼呢？

首先，這顯示了西方文化可以被地方的文化實踐所完全同化吸收。然而同時，我們所提及的這些特殊形式與相當獨特的用途，唯有被看成是將徹頭徹尾的全球性文化加以在地化的努力，才會產生其意義。

第二點，這也突顯出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應當非常小心地面對任何主張全球化過程的「相對化」力量會徹底毀滅在地文化與利益的這種說法，但我們當然也必須認知到，這些全球性的勢力使得地方認同很難毫髮無傷地倖存下來。場所(locality)或「地方」(place)的意義在一個被光纖(fibre-optics)連結起來的世界中確實有可能經歷重大的轉變，而有些人則會對無論你身在何方只要「到麥當勞或肯德基一遊就可以給你美麗的一天」的這種說法打上問號。日本信心滿滿地對美國的卡通文化進行重塑創新，以反映出自己的文化傳統；然而在此現象的另一面，有些知識份子則擔憂這種「日式英文」(Japlish, 指被用於日語當中的英文字)會腐化日語。通常被舉出來的例子是年輕人們越來越流行說"sankyoo"(指"thank you", 謝謝)而不是說"arigato", 喜歡說"bye-bye"而不是說"sayonara"。

## 五、全球化是指「一個全球體系」

全球化的過程，比方說通訊科技的變遷或新興生產技術，以及「全球」意識型態的散佈，像是聯合國的人權宣言等等，這些事物對何謂可接受的國家、地方或組織發展的模式帶來一定的限制。洪宜安教授(Ien Ang)稱這些現象為「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es)，而「每一種認同都必須藉由與文化框架之間的相對關係來定義和安置自己」(Ang,

1991: 7)。讓我們重申此點：這不僅僅是簡單的全球「西方化」或美國化，這乃是一個更為複雜與互動頻繁的過程。

因此，關於「作為一個單一場域的世界」的這種概念，以及「在地行為者和全球結構互動的一個全球體系」，我們可以下怎樣的結論呢？首先，全球化乃是一種人為的過程，並非天生注定的；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謹慎看待將全球化詮釋為一種「客觀」與無法逆轉的力量的這種說法，不應輕易採納之，無論這些論證在意識型態上的根源為何。全球化乃是透過許多不同行為者的互動而產生(個人、地方、團體、組織、民族國家的政府等等)，這又牽涉到許多更為廣泛的結構與流動(比方說：世界貿易的規則，「全球性」的文化產品如百視達出租店的電影，以及針對全球性議題的公眾輿論，例如環境議題與國際恐怖主義等)。第二，雖然「單一場域」的概念意味著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互連性增長的過程，因此使得個別國家經濟或甚至國內公司似乎越來越不重要，然而我們還是有必要討論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以及其他社群性的情感。第三，全球化並不會帶來一個同質化的世界；相反地，對全球性限制的意識程度越來越高，反而有可能激發對個人、地方、國家或甚至文明認同的嶄新意識(請參見：Barber, 1996; Huntington, 1998; Smith, 1995)。最後，正如紀登斯所說的，全球化是一種將世界變成一個單一場域的過程，將過去被時空所分隔的人們給連結起來(Giddens, 1990)。就他來看，社會關係不僅僅是被延展到可跨越世界空間的地步，有時甚至會因為跨國媒體科技之故而進一步被「虛擬化」。雖然全球化乃是一個具有許多不同面向並多所爭議的過程，但它促使了人類事務的組織方式以及權力運作的方式產生重大的變革(Held *et al.* 1999; Sassen, 1999)。

這些都交雜成一幅複雜繽紛的圖像，指出一種全球化的理論，其中宏觀的過程與結構(比方說人們彼此通訊的方式之變遷 或消費型產品在何處與如何被生產與販賣)只是

---

**重要文本：**

D. Held, A. McGrew, G. Thompson and J. Perraton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譯者按：本書中譯本《全球化衝擊：全球化對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衝擊》一書由韋伯文化出版)。

---





科司特

科司特(Manuel Castells, 1941- )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之城市與區域規劃系與社會系的教授,於一九七九年受聘於城市與區域規劃系。一九八三年,科司特開始研究與資訊科技革命有關的經濟與社會轉型。其研究成果後來以三部曲形式發表成書:《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第一部《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1996, 2000 修訂再版);第二部《The Power of Identity》(1997);第三部《End of Millennium》(1998, 2000 修訂再版)[譯者按:此三部曲的中譯本由唐山出版,書名分別為:《網絡社會之崛起》、《認同的力量》、《千禧年之終結》]。他最新的著作為《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2001)。

故事的一部份而已,並非全部。故事的另一面則是:這些結構與過程經由地方認同與傳統的中介,而被行為者們以各自的方式所詮釋;這些行為者們又被特定的文化與世界觀所社會化。因此全球化乃是一種錯綜複雜的過程,沒有獨特的邏輯,也並不會朝向什麼無可抵擋的歷史定律邁進。上述所描繪出的這種豐富的全球化概念,強調在型塑單一世界場域的過程中實體因素的重要性,但同時也強調我們必須意識到全球化力量強化或改變認同的傾向。我們必須審視那些促成全球化世界出現的各種力量。

#### 肆、全球化的動力和特性

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將世界變成一個單一場域的過程是何等複雜,是故任何關於全球化之主要特質的簡單描繪或歸類編目都顯得無比薄弱。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指出這個多方競逐的全球化過程是在哪些主要的「地點」被型塑而成的。

## 一、世界經濟與新的國際分工

國家社會主義的崩潰似乎預示了真正遍及全球的市場經濟已然實現，雖然說像波蘭與斯洛維尼亞這樣的國家，更別提像俄羅斯、蒙古或古巴等國，它們會以何種速度被完全整合進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體系當中，這然後是個可以被質疑的問題。尤有甚者，在世界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仍然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以及更為貧窮的次撒哈拉地區的第四世界國家，在經濟上處於非常邊緣化的位置。而全球經濟也不是沒有它的風險與喪失自信的可能。紐約的世貿中心被毀以及金融市場崩潰等事件，皆彰顯著於世界經濟慢慢落入衰退期時我們所遭遇到的壓力與緊張何等明顯。航空公司遣散了數以千名的員工，並且取消了某些飛行路線，而政府則警告說我們有必須全國上下勒緊褲帶、節省開支，為了因應恐怖主義的威脅而作出必要的犧牲。

對強調全球資本主義不僅真實而且成功、世界秩序也一派祥和的那種意識型態來說，這不啻是一計警鐘，然而我們也不應就此忽略或低估了接連而來的重大與長期的轉變。許多金融市場、以及越來越多與通訊和處理、傳播資訊有關的事物，如今都處於大前研一所謂的「無國界的世界」當中，或者是「看不見的新大陸」(Ohmae, 1989, 1999)；而在這樣的世界中，傳統的國家管制與控制機制通常都使不上力。在新的世界經濟中，「成功」往往是奠基於資訊的產出以及品牌和服務的行銷，而非產品的製造。在這種經濟中(有些人稱之為「後福特式」，以便和資本主義下高度工業化的大量消費形式，也就是「福特式」作出區分)，位置和勞動力已經不再是經濟成功與否的最首要因素了。能夠導引許多生產範疇的新興資訊科技形式，使得產品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產，而不太需要勞力密集的生

---

此詞彙乃是以汽車大亨福特(Henry Ford)為名，他是製造業之大量生產技術的先驅。

---

## 新焦慮時代來臨？

柏萊(Michael Burleigh)於二〇〇一年九月三十日在星期天泰晤士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提醒我們注意恐怖攻擊所導致的情緒方面的影響。他認為二〇〇一年發生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造成了翻天覆地的效果。我們原本處於一個具有確定性的時代，美國在這個時代中坐享史無前例的消費增長，並將國防預算從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百分之六減到百分之三；然而我們現在卻一夜之間進入了「焦慮的時代」。他表示，這種情緒乃是顯而易見的，而且不只是美國人會有這種感覺。

產方式，或是可以支撐這種生產方式的社會與政治結構，像是有組織的工會主義與無所不包的福利供給。生產技術與營運手法的彈性化、以及資訊科技的整體影響等，轉變了核心國家中許多人對於工作的定義，但也同時促使邊緣的經濟體如「智慧島」新加坡等，可以在重要的產業部門如微電子器材方面，快速地整合進世界經濟主流當中。整體來說，這些發展對全球化世界中的另一個核心建制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也就是民族國家。

## 二、世界政治秩序：全球治理？

許多關於全球化的討論都會強調全球化對民族國家之主權和自主性的負面影響。儘管如此，主權國家仍然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為者，然而此種核心性近來顯得越來越脆弱了，最明顯的一點是，各國政府很難真正落實那些與世界金融市場利益相違的政策。即便是身為國際組織如「歐洲匯率機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的一員，也難以阻擋金融市場的力量，導致政府意圖達致貨幣穩定的努力失敗，英國、義大利、法國在一九九一與一九九二年時就有過類似的遭遇；英國和義大利更是出於

### 歐洲匯率機制(ERM)

該體系力圖建立與維持歐盟貿易伙伴之間的貨幣穩定性，其作法是將貨幣的匯率限制在特定的「範圍」之內。

關於近來某些企圖管制網路的努力，請參見第 頁。



這幅漫畫出自墨西哥的一份報紙，它赤裸裸地呈現出一個主題：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只有少數人是贏家，而大多數的人都是輸家。此幅漫畫旁的附文把墨西哥當作例子，說明一個窮國實際上毫無選擇的餘地，只能接受經濟全球化的力量，雖然有可能從中獲取某些利益，但更有可能在經濟衰退的時候遭受嚴峻的打擊。

資料來源：Cartoons in Focus.

贏家與輸家：經濟全球化的「落塵」？



拉封登

拉封登(Oskar Lafontaine)是前任德國社民黨主席，在德國總理施洛德執政期間擔任德國財政部長，但於一九九九年時突然辭去此二職務。他與社民黨內的商業派份子意見相左，主張國家應該有所行動以對抗全球化以及不受限制的市場所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不僅僅就德國來說是如此，在整個歐洲層級上也是。一九九八年，他與妻子合著了一本書以進一步闡述他的理念，書名為：「別擔心全球化：人人均享的工作與財富」(Don't Worry about Globalisation – Jobs and Wealth for All)。在這本著作中，他提倡要提高薪資，以便同時提昇國內需求；這種主張與新自由主義經濟下重視供給面的主流政策可說是正面衝突。

該組織對其貨幣的高度干涉因而選擇退出。除此之外，各國政府也越來越無力管制網路上唾手可得的各種流通資訊與娛樂，因為有太多影像與訊息可以透過幾乎無法被控制的網路等類似事物而暢行無阻。

區域性、多邊性與準超國家組織(如歐盟)等的成員身份，亦威脅到了民族國家作為國家團結性與認同代言人的地位，還威脅到了它作為個別公民和組織的主要支持與要求對象的身份。我們應該小心不要過度強調此種轉變，但顯然我們很容易觀察到的現象是，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利益團體開始經常性地在布魯塞爾和史特拉斯堡等地進行遊說，這是因為它們認為歐洲層級的組織在那些會影響到自身的政策過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有時這也是一種跳過那些不認同其主張的國家層級決策者的策略。同時，這類團體的領導者與成員們不會認為自己因為這類的行動就變得比較「歐洲化」，相反地，他們的所作所為使他們依舊覺得自己很「法國」、「義大利」、「荷蘭」、或「英國」。跨國界的交流本身不盡然會使人們覺得比較「歐洲化」或減損其國家認同，這使得有必要促進共同的歐洲目標或認同的歐洲層級官員們感到很棘手。歐盟為了要促進過去被國家、語言、文化所分隔的民族們進一步地彼此合作，因此設立了許多跨國界的政區，稱之為「歐洲邊界合作區」(*euregio*)，它們位於歐盟內部某些國界的交會處上。這類區域的功能在於促進跨國界的合作，貿易、觀光和其他共同利益範圍內的各種交流。其中一個邊界合作區「馬斯 - 萊茵」(*Maas-Rhein*)位於比利時、荷蘭和德國的交界處。它擁有由重要的政治、商業和文化利益團體所組成的區域性議會(為一種國會形式)，也是一個具有諮商性質的組織和審議的論壇。

雖然這類的發展溫和而緩慢，然而它們亦有可能擴展政治活動與治理行為的範圍，使之跨越國界，並因而使我們必須重新定義何謂國內政治。另一方面，這也有可能是



種政治認同遭受劇烈轉變的過程，比方說團體或地方被完全地「歐洲化」；雖然目前為止我們沒有什麼實質的證據可以證明這類說法已經成真。

當然，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派(realist)自然會強調國家在某些重要的政策範疇如經濟管理與公民流動性方面仍然具有顯著的重要性，並且還會特別指出許多個別國家與那些即使是最強大的商業公司比起來還是無可置疑地擁有某些它們所沒有的資源。國際管理學者如波特(Michael Porter, 1990)等人所做的研究也顯示出，某些國家因素在解釋大公司的全球性成就時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圖15.3企圖呈現這個觀點，不過當你在看這個圖時，請謹記大前研一所說的「無國界的世界」，以及經濟生活中的實際交流越來越與民族國家無涉的事實(Ohmae, 1989)。整體來說，這些討論都指出了在全球化力量的衝擊下，世界政治與世界經濟的樣態正在急速地變化當中(Cerny, 1990)。國際關係學者拉吉(John Ruggie)表示，全球化並非完全地致使民族國家衰頹或甚至是瓦解，相反地，全球化「重組了國際政治空間」(Ruggie, 1993)，民族國家只是該新興結構的組成要素之一而已，其他要素還包括了多邊組織如聯合國等，區域治理形式如歐盟，跨國的利益團體以及社會運動等，世界政體樣態則不斷在改變當中，接納新的政治要求與議題進入討論議程中，但同時也使舊有的形式被邊緣化。

我們在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以及世界銀行等組織的所作所為當中就可以看見國際治理與全球治理正在增長的證據。那些負責管理非法藥物流通與監控各國如何回應氣候變遷的各種國際組織也是明顯的例子。隨著新世紀的開展，我們發現國際組織似乎越來越願意檢視與批判各國政府和私人組織(如商業公司等)管理其「內部」事務的方式，這包括了金融、貿易、安全與人權等領域。同時，國際性與跨國性程度的增長卻又因為以下的事實而顯得沒那麼突飛猛進：那就是許多與世界治理有關的組織實際

#### 現實主義(realism)

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一支，假定地域性國家(territorial state)在世界秩序之運作中扮演核心的角色。把國家描繪成是集體的行為者，其行為準則乃是追求自利。國家間的合作被視為是不自然的，只有在這符合以國家利益為前提的大戰略時才會予以支持。普遍來說顯而易見的一點是，這個世界處於無政府狀態，並且充滿敵意。

在圖 15.3 中，「要素的狀態」(factor conditions)指的是有技術的勞動力與良好的通訊結構等事物；「需求的狀態」(demand conditions)指的是對該產業之產品或服務的國內需求之本質；「相關產業與支援產業」(related 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指的是供應商的競爭性；「公司策略、結構與競爭行為」(firm strategy, structure and rivalry)指的是掌管公司之設立與管理的那些法令和規範。

關於超越民族國家的治理行為，相關的延伸討論請參見第十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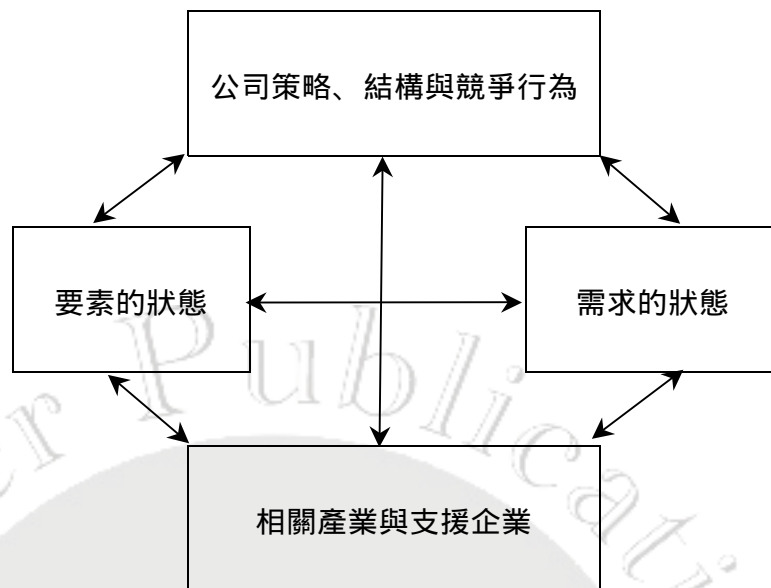


圖 15.3：波特的國家之全球性成就模型 (1990)；經 Macmillan 出版社同意借用轉印。

上都被世界上幾個強權國家所主宰。這使得某些小國作出這樣的結論：國際組織所提出的那些全球性議程，其實只是在掩蓋核心國家(特別是美國)意圖輸出其價值與利益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並且維持其相對霸權的事實。這種論點當然具有很高的爭議性，不過這也使得我們不得不質疑國際組織型塑與落實全球性標準(像是在環境與國際安全等層面)的能力，而這些標準又理應被國際社群中的所有國家視為具有正當性才行。上述的一切在在顯示出國際組織與國際建制所涉入的議題範圍與政策領域每年都在增長，這使得各國政府越來越敏感脆弱，對自己的自主性也越來越不那麼肯定了。

世界主義的(cosmopolitan)  
此處的用法乃是指超越地方主義，此詞彙也被用來指稱國家認同、利益與偏見的消失或超越。

### 三、全球文化

全球文化或世界性文化的概念對某些人來說是個自我矛盾的詞彙，因為他們認為「真的」文化會將人們與特

### 英國首相布萊爾在二 年的達沃斯世界經 濟論壇發表演講

布萊爾就像許多其他的政治領袖一樣，覺得有必要強調自己對互連的世界經濟的支持。他現身於世界經濟論壇的行為本身就明顯地代表了此承諾；世界經濟論壇乃是個許多政治人物、企業領袖與其他意見領袖的年度聚會。



定的地區給緊緊綁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國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s)乃是「真的」文化，其中充滿了意象、象徵以及對人民來說所具備的各種意義，由於它提供了關於起源為何的神話或迷思，國旗以及語言等等，因而使得人們有一個可以據以參考的脈絡，從而認識到自己究竟是誰。但另一方面，全球文化一點都不是如此，它是從普及的全球性商品以及無所不在的影像中產生的，這些影像又是由廣告以及日益擴大的全球性娛樂產業所傳播。同時，人們通常認為全球性的文化模式會侵蝕那些較為傳統與地方性的認同。但這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不是一個單向的演變過程，有時反而會醞釀出抵抗型的政治，並重新肯認不同的世界觀與古老的地方傳統存在的必要性。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這麼說：文化、認同與地方之間的分離，隱含在全球文化的概念當中，這可說是一種辯證過程的一部份，在此過程中有可能會產生出去空間化的文化，也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產生出去地域性的政治與治理形式，就像我們之前已經指出過的現象一樣。

前述的全球化之特質顯示出它並不只是一個多面向的過程，還是一個潛藏著許多緊張關係的過程，而這些都影響了全球體系充滿競爭張力的型塑過程，並凸顯了在同

質性增加之外, 多樣性也同時增加的可能性。以下將概述此論點。

#### 目的論(teleology)

一種關於萬物的最終目的的理論, 主張一切都將朝向一個被預先決定了的結局發展。

### (一) 秩序與失序

社會變遷的目的論式詮釋(teleological explanations)認為歷史過程會朝向一個無可避免的目標或最終狀態而開展。很顯然地, 關於這個目標或最終狀態為何, 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是一個社會主義式的烏托邦, 有人說自由民主體制會在世界各地大獲全勝, 或是全球的新自由主義, 或是一個具有多重核心的世界, 主權相互交疊, 具有多重管轄權等等, 亦或一個單一的世界社群與政府; 然而, 所有這些理論觀點所預設的最終秩序, 顯然似乎都與當今世界政治以及許多生活領域中人們所感受到的那種高度的無常與失序感相去甚遠。這不只是傳統的確定性被摧毀的問題, 像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崩潰以及被兩大強權所主宰的兩極體系的終結; 這還包括了其他面向的問題, 比方說: 數位化生產所引發的就業前景之波動, 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與社會之錯置(dislocation), 或是將裝配工廠轉移至其他地區以便降低成本。前述曾提及的「焦慮時代」, 與福山(Francis Fukuyama)口中的那種一派祥和但其實也有點無聊的「歷史的終結」, 二者看來是大相逕庭。整體來看, 全球化的過程似乎加快了個人與集體認同轉變的速度。有時人們會認為這種轉變是種解放, 但人們更常視之為是種威脅, 而他們的反應可能是企圖透過某種政治行動或運動, 重新創造出一個更為穩固的過去, 但這同時也導致了更進一步的失序現象。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並不會比一個因國家衝突或強權競爭而陷入撕裂的世界還要來得更為安全或穩定, 至少目前來看還不是如此。

### (二) 全球化與在地化

全球化過程與全球性組織使得國家認同與地方認同



和文化實踐等被相對化，而跨國形式和後國家形式等的建立(比方說多邊的建制、商業上專業人士之間的網絡、金融、科學、社會運動等等)，則使地方規則或價值被邊緣化，或是置之不理。同時，許多全球性的實踐活動其實受限於隱含的(但有時也可能是相當明顯的)「在地化」，以便吻合地方上的品味，但也同時是在保護地方認同。

### (三) 地方與空間

現代世界以及前現代的世界顯然都是充滿著各種「地方」(places)的世界，這些地方對居住在其上的人們來說則有著各自獨特的意義。地景、大自然的影像以及社群之間在實體上的相互分離，這些對確保地方認同和國家認同來說是很重要的元素。全球化卻侵蝕了這種地方的親密性，這部份是源於我們享有更大的實體流動性，另外也是因為全球化使不限於特定地域、不需要面對面的溝通就能維繫的那種利益與社群得以存在，比方說網路上的「虛擬社群」或是新興社群等。由於這些現象的發展，人們開始對「真實的」地方以及真實地方所支持的那種「完整的」生活方式產生濃濃的懷舊之情，並對某些觀察家在「全球性城市」中所發現的那種拼貼式與世界主義式的生活方式有所反感；這些「全球性城市」包括了倫敦、紐約或里約等，甚至在某些專業人士間的虛擬社群中也是如此。

### (四) 同質化與多樣性

全球化所散發的一個重要訊息是，雖然看起來在全球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的表層上，全球化確實帶來了麥克格魯(Anthony McGrew, 1992)所謂的「本質上的同等」(essential sameness)，但是這種同等可能只是虛偽的表象。表面上的一致性掩蓋了眾多的多樣性，並且對不同世界觀其長久的生命力視而不見。此外，全球化的過程具有多重層次(多面向)，且是由眾多相互衝突的力量所驅使。全球



化也是由那些各自擁有不同過去的人們所「打造」而成，這些人通常擁有堅定的認同，而他們的認同往往與透過「輕鬆一下，喝口巴得冰啤酒」(chillin' out with a Bud)這種廣告標語來行銷的世界捍掙不入。正是因為如此，全球化依舊是個相當難以預料的不定過程，有著各種可能的結果。

## 伍、全球化的媒介

我們已經質疑了「全球化會產生一個同質化的世界、或是邁向一個已經被決定了的歷史目標或最終狀態」的這種說法。福山(Fukuyama, 1992)關於世界歷史的目的論式理論，以及華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型塑視為是種長期循環過程的這種理論，他們都洞悉了全球化的某些面向；然而，他們也都低估了在這樣一個根本尚未完成或充滿各種競爭勢力的發展過程中，各種難以預估的因素之存在。羅伯斯頓(Roland Roberston, 1992)認為，即使是在當今的世界歷史轉捩點上，我們也可能有著各種不同的全球變遷軌道；但到底那種未來有可能會發生呢？

### 重要文本：

I. Wallerstein (1974), 「近代世界體系：第一卷」(The Modern World-System, Vol. 1),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譯者按：三卷的中譯本皆由桂冠出版，1998]



華勒斯坦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28-) 視為是他那個時代裡最創新的社會科學家之一，其最著名的學術成就為在一九七〇年代創立了「世界體系學派」，他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探討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這種新興的方法論為二十一世紀中關於「全球化」的眾多學術辯論立下了根基。

## 一、地域性民族國家世界的終結

在一個互連程度越來越高的世界裡，民族國家的未來看起來似乎不堪一擊。不過國家仍然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行為者，因為關於主權的迷思仍然得以對國際體系運作的方式加以強大的限制。「國家」在如何定義國家社會與文化上依舊佔有關鍵性的地位，並且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謂關於民族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的核心(Anderson, 1983; 請參見第八章關於「民族主義」的部份)。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之內，地域性國家消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雖然「地域性」(territoriality)的意義與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的專擅，顯然會被跨國勢力以及國際組織、跨國組織等事物所進一步地影響。即便是在一個徹底被全球化的時代當中，國家對某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領域的掌控與裁量權仍然會相當深遠，表 15.3 可顯示出這一點：

除了個別國家的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的不同之外，上述這些數字整體來說所顯示出的訊息是，在一個劇烈走向全球化的時代裡，有些國家似乎非常抗拒那股迫使他們減少國家財富支出的市場壓力。然而這類的抗拒(如果說「抗拒」一詞並不為過的話)是否能夠一直維持下去，還得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在其他的政策領域中，這類支出比例間的不同程度更大，這是源於那些提供決策之基本脈絡的國家多樣性與文化傳統之不同。在英國，目前執政的工黨政府一心一意想要確保勞動市場的彈性，促使英國成為就此方面來說管制最少的西方國家。多國籍公司如果決定要關閉一家工廠或是裁減部份人員的話，將不會招致任何懲罰。在同樣身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歐盟成員的法國，如果有公司選擇要將生產地點轉移至其他的國家，或是完全停止某些設備的營運，通常都會因為必須支

表 15.3 : 政府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

	1960	1980	1998
澳洲	21.2	31.4	32.9
英國	32.2	43.0	40.2
加拿大	28.6	38.8	42.1
法國	34.6	46.1	54.3
德國	32.4 (西德)	47.9 (西德)	46.9 (東西德加總)
義大利	30.1	42.1	49.1
日本	17.5	32.0	36.9
瑞典	31.0	60.1	60.8
美國	26.8	31.4	32.8

資料來源：OECD (1999)

付補償金與罰款之故而面臨沈重的財政負擔。簡而言之，因為全球化之故而導致各國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同一化、並且認為這是種顯然很容易就觀察得到的趨勢，對於這種簡化的概念我們理當特別謹慎小心。

## 二、後資本主義式的世界經濟秩序？

華勒斯坦認為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已然是個後資本主義式的世界經濟秩序；任何關於它是否可以影響全球的質疑，都已經因為共產主義的崩潰以及後共產主義政權發瘋似地追求經濟與社會雙方面的市場化，而煙消雲散了。只有非常少數的地方與行動不會被資本所滲透：亞馬遜盆地的原始部落與硬木砍伐公司之間的戰爭似乎必敗無疑，而網路購物和電子商務、以及將「貝克漢」(David Beckham) 打造成全球性的品牌等等，這些都屬於世界商品鏈以及新的文化經濟的一部份。福特汽車公司透過其「福特兩千」(Ford 2000)計畫，將自己轉型成一個全球性的組織，無論在哪裡都可以銷售其全球性的產品。事實上，作為一個「純國內公司」的這種概念，對任何一個想要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企業來說，已經快速過時了；雖然說銷售某種與特定

地區有著緊密聯繫與認同關係的產品總是會有一定的市場，正如麥維他(McVitie)消化餅就是某種英國文化的象徵一樣。在二十一世紀中，世界貿易會越來越被那些努力想要戰勝其商業勁敵的大型跨國公司所主宰，特別是在重要的產業部門如電信方面。在這新的千禧年中，以下的轉變將會臻至完成：從奠基於國內公司與大量生產的組織性國家資本主義，轉變成無組織的資本主義，所強調的重點在於市場佔有率、特定的市場區隔、專業化與電腦輔助的生產技術、打造全球性品牌、行銷策略、以及提供服務而非生產實際的商品等。

這些發展使得治理的本質產生了不確定性，特別是關於經濟活動的管制方面，因為經濟活動已經越來越全球化了。地域性的民族國家通常已經沒有能力對跨國性的組織施加控制，或是要求其負起責任，而合作性的管制形式如國際貨幣基金或歐盟等，可能還比較有辦法確保公平競爭或是保障消費者的權益。但正如前述，這類組織以及其管制權的正當性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跨國性的非政府組織(trans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NGOs)在許多不同的領域中活動，比方說對污染的控制或是其他環境保護形式等等，這類組織在數量與活動領域方面的增長，有助於行使實質上的民主功能，監督那些脫去國家認同外衣的強大企業體與治理機構，此外對某些人來說，這也象徵著全球公民社會的活力日漸增長。

### 三、一個全球公民社會？

某些組織如「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等其或隱或現的普世性，似乎暗示了全球一體性意識的增長，或是人們越來越有全球風險意識；這可說是所謂「草根式」(grass-roots)全球化的一部份，和所謂「由上到下」(top-down)

式的全球化相對；「由上到下」式的全球化可以在諸如聯合國與世界銀行這類組織中觀察到。很弔詭的一點是，這種普世性同樣擁戴對「差異」的尊重，或是對於差異的容忍。那些全球性的文件(比方說關於普世人權的文件)就明列支持一整套的管制方式、制裁、教育計畫與政治行動形式等等，力圖達成此目標。全球公民社會究竟存在與否乃是一個被激烈爭辯的議題；所謂的「全球公民社會」指的是一個跨國結社與審議的場域，不受國家或市場的控制。我們往往會發現，那些關於全球公民社會正在運作當中的例子，像是西雅圖異議份子所形成的抗議網絡，或是日內瓦社會論壇，以及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s)的行動等等，這些例子之所以會如此享譽於世，主要是因為它們都在對抗那些強而有力的全球組織。這種「從底層發起的全球化」無疑就是佛克(Richard Falk)所說的「一種更多采多姿的政治類型」(1999)，但它是否構成或甚至是促進了較為透明化與負責的全球治理形式，這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超越國界的治理(Halliday, 2001)仍舊是由國家組織、國際組織、區域性組織以及初級的普世性組織等翻騰互動所構成的，並且越來越與持續增長的非政府組織(NGOs)、社會運動以及各式各樣的網絡等交織在一起。未來有沒有可能達成更進一步的實際合作，而不再只是流於形式與表面的辭令，這當然還有很多變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 NATO)為了明確表達與美國的反恐戰爭站在同一陣線的立場，因而首次訴諸其憲章中的第五條條款，也就是對其中一個成員國的攻擊就意味著對全體成員的攻擊。雖然說成員國有著各自的國家利益，他們對持續性的反恐戰爭的投入程度也有很大的不同，然而這些都比不上他們獲知世貿中心遭攻擊一事時當下所表示出來的義憤之情。在這個新世紀的開端，我們可以發現有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



### 在地的反抗、全球的鬥爭： 節錄自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網站

<http://www.chiapaslink.ukgateway.net/>

雖然查巴達反抗軍主要關注的是地方上的政治腐敗、排外與暴力問題等等，並且企圖在社群的層面上另闢解決途徑，然而其起義的行為無法與全球化的力量分而論之。契亞帕斯省的原住民被邊緣化的現象可以追溯到五百多年前西班牙人入侵的時期，當時就已經建立了對當地人民進行剝削、並將自然資源輸出到「第一世界」的這種結構。查巴達反抗軍非常清楚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其社群、文化與環境會帶來怎樣的毀滅性影響。這些影響由於一九八〇年代早期開始的一連串新自由主義式經濟改革而雪上加霜，成了起義反抗的導火線。因此他們選擇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生效的頭一天拿起自己手上的槍。他們預料將有一千五百萬農民未來會被從土地上連根拔起，若此預估準確的話，那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無疑是在對農民們宣判死刑。

的各種新舊形式(族群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宗教上的基本教義派等等)使得地方政治與世界政治更形不穩，因此「混亂」或許才是新千禧年的標誌，而不是普世主義與秩序。

#### 四、文明衝突的前景

某些學者甚至大膽預估在冷戰結束之後，根深蒂固的古老衝突將會浮現，或是「重現」。他們在此處所指涉的是我們在盧安達或前南斯拉夫中所可以觀察到的那種部落主義或極端的民族主義，不過主要還是指文明衝突的威脅。在這裡所謂的「文明」指的是最廣義的文化認同形式，透過歷史、語言、習俗或宗教等等將人們給凝聚在一起。要清楚地區分不同的文明不是件簡單的事，然而像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 1993 and 1998)這樣的學者卻已經信心滿滿地分類出幾個他所謂的「文明認同」：西方文明、儒

家(中國文明), 以及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 - 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 還可能有非洲文明。他認為這些文明在歷史上構成了重大的「斷層」, 這些斷層雖然被現代的衝突形式如左右翼之爭、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強權間的爭鬥等等所掩蓋, 但在歷史擺脫了冷戰氛圍的約束之後, 又重新浮上台面。這些斷層之所以會重新出現, 乃是因為文明認同比現代政治教條所打造的那些認同(包括民族國家提倡的國族主義)更為長久與原汁原味, 也是因為文明認同在這個充滿不確定的全球化世界裡提供人們情感上(如果不是物質上)的避風港。

通常會被明確當成關注焦點的乃是所謂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 他們逐漸在現代國家如土耳其或正在經歷現代化的國家如阿爾及利亞中取得越來越大的號召力, 並且他們還有可能破壞某些大都會型的國家如法國等其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常軌。就某方面來說, 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與回教徒間的衝突、車臣與俄羅斯間的衝突、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與馬其頓之間的衝突等等, 都是這些宏觀的主旋律於地方上的變奏。從此世界觀出發, 我們就有可能以如下的方式來詮釋美國和大陸之間在二〇〇一年時所發生的不幸意外: 一架大陸的噴射機和一架美國的情報偵察機在空中相撞, 這顯示了文明間的差異與文化上的隔閡, 雖然「民族情感間的衝突」這種說法可能比較接近事實。伊斯蘭文明的世界觀和西方文明的世界觀之間無疑有著相當深的「他者感」(otherness)或差異。然而, 這種啟示錄式的文明衝突觀應該要被修正, 因為回教國家和非回教國家之間有著許多經常性的交流活動, 其交流形式包括貿易、觀光旅遊與文化上的交流切磋等。若從這個角度來詮釋世界衝突, 那麼沒有哪個文明會是個龐然巨獸。一九九一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引發了波斯灣戰爭, 而在此戰中所形成的戰略同盟顯示出, 回教國家出於國家利益之故, 還是有可能隨時拿起手上的武器對付其信仰同一個宗

教的伙伴們。然而，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於美國發生世貿中心與五角大廈的恐怖攻擊事件之後，馬上發生的後續效應是有越來越多人開始討論那些使不同社會產生隔閡的文化特質，而對某些鼓吹文明衝突論的人來說，這甚至是文明衝突再興的前兆。許多西方世界的領袖們與輿論塑造者們馬上開始撇清自己和那些偏激的評論間的關係；那些評論述說著來自於伊斯蘭社會、擁抱伊斯蘭價值的恐怖份子們對西方文明所造成的威脅。溫和的伊斯蘭信徒則譴責那些極端份子們的「聖戰」(jihad)心態。然而，尚未成熟的全球化世界其脆弱之處已然由這些事件中展露無遺。如果我們的世界已經被這些恐怖攻擊所徹底改變，那麼其新輪廓為何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明朗。

## 五、全球混亂？

在福山(Fukuyama, 1992)的想像中世界會走向歷史之終結，而美國前總統老布希於一九九九年呼籲要在冷戰的廢墟上重建「新世界秩序」，這兩種說法或許都對全球未來的走向過度樂觀了。「全球性」(globality)的境況以和平的世界秩序作為其主要賣點，此秩序則以市場資本主義和「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的形象出現，或是以一家大型購物商場的形象出現，向「麥當勞和迪士尼的合體」(McDisney)致敬(Ritzer, 1993)；這似乎暗示著我們的世界已然走在趨同的軌道上了。然而，我們上述所討論的種種卻顯示出一個更為騷動的世界，它可能比這些和平的模型所表彰的一切更為混亂和充滿焦慮。在這樣一個在地化和全球化都同時加劇的世界中，某些組織形式的持久性比方說地域性的國家，以及其相對應的認同比方說國家的公民身份等等，看起來可能都會變得相當脆弱。當然，社會科學家們永遠必須對自己詮釋證據的方式特別小心謹慎，還必

---

關於民主的不同形式，相關的討論請參見第五章。也請參見第 頁。

---

須努力分清楚什麼是自己一廂情願的看法以及粗略的推測，而什麼又是好的證據。正是由於全球化過程所牽涉到的範圍以及所具有的多重本質，使此任務變得比以往更加艱難了。然而，研究政治學的人不可輕忽那些不只是超出民族國家範圍、還凌駕其上的政治與社會力量所帶來的衝擊。

## 陸、結論

在本章中，我們探討了全球化的研究是如何為政治與社會生活的理解和研究加入重要的新面向。首先，它使我們注意到政治、經濟和文化之間的特殊聯繫，而這種聯繫在國家社會的研究中相當少見。雖然有些理論仍然將焦點擺在一個單一的因素上，認為該因素可以促成一個「單一的世界」之建立，但這類的理論途徑很難完全掌握到全球化這種多面向過程其龐大的複雜性。第二，它使我們不再將焦點只放在國家社會上，將其視為社會分析的重心與主要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之載體；而是顯現出社會、經濟與政治關係如何跨越全球進行廣泛的延伸。第三，它減低了我們在分析社會與政治關係時往往僅聚焦在某一特定「分析層次」(levels of analysis)的這種傾向。相反地，全球化的研究連結了個人層次與全球層次，彰顯出個人的認知與對全球化的經驗可以如何對更廣泛的運作過程產生重大的影響，同時也彰顯出這些過程又是如何影響個人認同和集體認同。在這個包羅萬象的政治世界當中，故事的結局仍然懸而未決。

此概念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深入探討過；我們運用這個概念來探索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繫。

### 本章結論

- 「全球化」不只是國際政治的代名詞而已，但它簡略地代表了許多促使世界成為一個「單一場域」的眾多過程。
- 這些過程既非線性的也非目的論式的，而是複雜的、具有多重面向的，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以多變的強度在發展。
- 在當前這個更為劇烈的全球化時代中，有許多指標可以幫助我們詳細指出此過程的範圍與強度。這些指標包括：國家與社會間的互連模式、全球意識的程度、對「全球化同時牽涉到相對化和在地化」的認識、對全球化的抵抗程度、以及對「全球體系」的概念等等。
- 不同的學門以及世界觀會對全球化有不同的詮釋，甚至通常是相互矛盾、對立的詮釋。
- 全球化具有許多不同的特質，包括經濟和政治的因素，但也包括文化因素。
- 全球未來的走向有數種可能，有可能是和平的、大致上來說走向西方化的那種世界秩序，也有可能漸漸傾頹、走向全球混亂。
- 從學術研究與社會理論的觀點來看，全球化對社會與政治生活的組織方式、以及維繫認同的方式等等，提出了重要的質疑。

### 重要讀物

- Axford, B. (1995) *The Global System: Economics, Polit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本書檢視那些浮現全球化壓力的種種面向，並強調全球化的文化面以及對全球化的抗拒。
- Beck, U. (2000) *What is Globalis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一個重要的社會評論家對全球化的過程提出具有煽動性的個人觀點(譯者按：本書中譯本由臺灣商務出版，孫治本譯，1999)。
- Castells, M. (1996) *The Network Society* (Vol. 1), Oxford: Blackwell. 作者探討世界社會之主要動力的三部曲著作中的第一本，對社會理論有重大的貢獻。
- Held, D., McGrew, A., Thompson, G. and Perraton, J.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一本範圍極廣又相當嚴謹



的研究著作, 包含不同的理論面向, 並網羅了豐富的各種全球化面向上的實證資料(譯者按: 本書中譯本由韋伯文化出版, 沈宗瑞等譯, 1999)。

Hirst, P. and Thompson, G. (1999) *Globalisation in Question*, 2nd ed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本書對全球化提出打破因襲的批判性觀點, 指出「全球化經濟」的概念根本就是個迷思而已(本書中譯本由群學出版, 2002年)。

Scholte, J-A. (2000)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對這個有必要從多面向的角度來研究的主題來說, 這是本相當有用又具有批判性的介紹性書籍。

### 進階閱讀

Drucker, P. (1993) *Post-Capitalist Society*, London: Butterworth-Heinemann. 管理學界的大師級人物針對「無國界的世界」中各種社會與經濟變遷所撰寫的一本好讀又鞭辟入裡的著作, 然而可能有些過於樂觀。(譯者按: 本書中譯本「後資本主義社會」由時報出版, 1994年)。

Falk, R. (1999) *Predatory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精選文章合集, 大多數是在批判全球化對許多生活面向所帶來的衝擊。

Gibson, W. (1984) *Neuromancer*, London: Gollancz. 第一本從科幻小說的角度來描繪後啟示錄時代的全球化世界之著作。

Halliday, F. (2001) *The World at 2000*, Basingstoke: Palgrave. 就該位國際關係學界中的重要理論家在倫敦政經學院所發表過的演說, 進而彙編成的文章選集。

Kennedy, P. (1993)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HarperCollins. 一位歷史學家對全球化趨勢的看法, 著重於某些因素(如環境的變遷等)對世界上的不同地區所帶來的衝擊(本書中譯本「未雨綢繆: 為二十一世紀做準備」由北京新華出版社出版, 1994年)。

Naipaul, V.S. (1982) *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Harmondsworth: Penguin. 一位知名小說家行經革命後的伊朗與其他回教國

家的旅行經歷, 檢視全球化(西方化)的壓力與伊斯蘭認同之間的緊張關係(譯者按: 本書中譯本「在信徒的國度: 伊斯蘭世界之旅」由馬可孛羅出版社出版, 2002 年)。

Ohmae, K. (2000) *The Invisible Continent*,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關於「無國界的世界」這個主題最著名的學者之一的最新著作。

Ritzer, G. (1993) *The 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Newbury Park, CA: Pine Forge Press. 對美國化的全球文化所帶來的衝擊進行有趣又充滿洞見的探討(譯者按: 本書中譯本「社會的麥當勞化」由弘智出版, 2002 年)。

Klein, N. (2000) *No Logo*, New York: HarperCollins. 探討品牌化的資本主義, 雖然過於誇大但仍然相當有趣。

####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 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 本試閱版僅提供尚未上市的校稿版本, 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先睹為快。所以, 此試閱版本不論是內容或排版, 都與最後上市的版本, 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 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向敝社反映, 以便在正式送印之前能做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 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 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 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 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 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 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